

【帝制中国】

明初的汉族元遗民

张 佳

提 要:元明易代虽以统治族群变更为表征,却催生了大批汉族元遗民。本文通过勾稽诗文集集中的零散史料,归纳北投元廷、遁迹僧道、力绝征辟、拒奉明廷正朔等几种汉族元遗民常见的行为方式,以展示这一群体的整体样貌。元遗民的广泛存在,致使朱明新政权面临政治合法性困境。明初许多重要史事的缘起,诸如修纂官史曲讳元季史事、制定酷法强制士人出仕、整肃民间礼俗等,均须在这一背景下才可得到恰当的解释。

关键词:元明之际;汉族元遗民;“君臣大义”;“华夷之辨”;政治合法性

所谓“遗民”,是指在王朝易代之际因忠于胜国而拒不认同新朝的人士,这是宋代以降王朝更革之时常见的社会和文化现象。蒙元是由汉化甚浅的草原民族,通过残酷的暴力征服建立的帝国;然而当元祚倾覆、朱明立国之后,不仅曾在蒙元享受特权的蒙古、色目人追怀胜国,即便曾经深受歧视的汉人与南人,甘愿为蒙古王朝守节终老者,亦甚为多见。由元入明、由“夷”入“夏”,何以造就了众多的汉族元遗民?“君臣大义”与“华夷之辨”是传统儒学的两大基本命题,为异族君主守节的汉族遗民,如何在这二者之间抉择取舍?这些都是元明易代之际,值得探究的历史问题。因为史料的畸零、以及后人元明易代“华夏重光”的读史预设,“元遗民”这一特殊文化现象被长久湮没,缺乏系统细致的讨论。¹上世纪60年代,钱穆在《读明初开国诸臣诗文集》及其《续篇》两篇长文当中,首次抉发元明之际士人夷夏意识淡漠、明初文臣普遍怀恋蒙元这一“大不如后人读史者想像”的历史现象;²萧启庆《元明之际的蒙古色目遗民》和《元明之际士人的多元政治抉择:以各族进士为中心》两篇论文,对元遗民中蒙古色

目人和进士两个特殊群体,进行了专门研究。³然而明初的汉族元遗民,数量远远超过蒙古色目人;元代科举殊不发达,身为遗民者,亦不以进士为限。明初的元遗民数量众多、身份各异,其怀恋故国、排拒新朝的遗民心绪,或发之于诗文吟咏、或见之于具体行事,有多样的表达方式。然而元明易代史料远不如明清之际丰富,许

¹ 目前有限的元遗民研究,主要是围绕赵汴、戴良、王逢等少数遗民学者文学家的个案讨论,少见较为系统的研究。相关研究可以参看章毅:《元明易代之际儒士的政治选择:赵汴、朱升、唐桂芳之比较》,载《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》第51期(2010年7月);何丽娜:《元遗民诗人王逢考论》,中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,2010年;袁宗刚:《抱到之遗士:元遗民戴良文学思想研究》,首都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,2009年;魏青:《元末明初浙东三作家研究》(戴良部分),济南:齐鲁书社,2010年。唐朝晖从遗民文学的角度,考察了浙东、广东和徽州等区域的遗民诗人群体,参看氏著:《元遗民诗人群研究》,海口:海南出版社,2007年。

² 钱穆:《读明初开国诸臣诗文集》、《读明初开国诸臣诗文集续篇》,收入氏著:《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》(六),北京: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,2009年。

³ 萧启庆:《元明之际的蒙古色目遗民》,收入氏著:《内北国而外中国:蒙元史研究》,北京:中华书局,2007年;《元明之际士人的多元政治抉择:以各族进士为中心》,收入氏著:《元代的族群文化与科举》,台北: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,2008年。

多遗民言行仅能得其一鳞半爪,难以进行细致的个案探讨。本文试图勾稽诗文中的零星史料,归纳汉族元遗民中较为普遍的行为表达方式,以期大略展示汉族元遗民的整体样貌。

一、北投元廷

早在元末割据混战之时,即有不少士大夫试图逃脱汉族群雄的控制,北上投奔他们奉为正统的蒙元朝廷。虽然非常重视安抚儒士、招纳贤才,但在朱元璋控制的区域,依然有不少士人北奔。婺源人汪同(?—1362),曾经组织乡兵抵抗红巾,战功颇著。至正十七年(1357年)朱元璋部将邓愈进攻徽州时,设计将其诱捕,汪同“抽刃欲自刺”不得,被迫伪降。至正二十年(1360年),汪同趁领兵出征饶州之机,舍弃在金陵为质的妻子,单骑潜逃。他先往杭州谒见元江浙行省丞相达识帖睦尔,又受降元的张士诚之召前往苏州,“见张心不纯”,后又北上中原投奔名将察罕帖木儿,共议收复江南之计。汪同还亲往大都朝觐,元顺帝“御笔褒宠曰‘江南忠义之士’”。¹

浙江平阳人陈高(1315—1367),至正十四年(1354年)举进士,授庆元路录事。方国珍占据庆元时,“欲招致之而无从得”。²至正十八年(1358年),打着韩宋红军旗号的朱元璋军队攻克处州,陈高作诗感慨“红巾攻破处州城,多少男儿入虏营”。³不久,平阳陷落,为了逃避朱军的征召网罗,陈高自诡行踪,“弃妻子,往来闽浙间,盖欲人不知其所在。”至正二十七年(1367年),浙江全境已尽入朱氏版图,陈高于是冒鲸波之险,“浮海过山东”,前往河南加入元将扩廓帖木儿幕府。陈高在幕府中“论江南之虚实,陈天下之安危”,为扩廓帖木儿规取江南献策。数月之后病死军中,葬礼上前来投奔蒙元的南士“皆来会哭”。⁴陈高的举动,在当时士人当中影响甚大。著名文学家揭傒斯之子揭泂(1301—1373)为陈高作墓志铭;名士苏伯衡(1329—1392)盛赞陈高深明取舍去就,“乡里有荣耀”,并将其遗文编定成集;而陈氏留在家乡的妻子,亦有好友专门照料。⁵

和陈高有类似经历的,还有著名遗民诗人戴良(1317—1383)。戴良早年师从黄潛、吴莱等浙东名士,和明初著名文臣宋濂是同乡兼同门。至正十八年十二月,朱元璋攻占浙东学术中心金华,戴良与许元、吴沉等儒士均被罗致幕下,受命为朱元璋进讲经史,一个月后又被任命为学官。⁶然而仕朱并非戴良本意。半年后朱元璋回归金陵,戴良旋即弃官出逃,投奔名义上降元且有“养士”盛名的张士诚。在张氏败亡前夕,戴良又泛海北上,试图和陈高一样经由山东投奔拥兵中原的名将扩廓帖木儿。不过当他抵达山东时,明军北伐也已进入齐鲁。戴良投军无路,只得重新返回江南。⁷数年后,色目遗民丁鹤年(1335—1424)在写给戴良的诗中,有“挟海怀山谒紫宸,拟将忠孝报君亲”之语,⁸所指即是这段北投扩廓的经历。为躲避明廷征辟,戴良晚年更名隐居四明山中,诗咏每有“黍离、麦秀之遗音”。洪武十五年(1382年),最终未能逃脱征辟的戴良,在金陵寓舍自戕殉节,死前“犹拳拳以忠孝大节为语”。⁹

元顺帝弃大都北逃之时,也有汉族士人追随出塞。浙江青田人林谏,元末官至兵部侍郎。明军北伐进逼大都时,为保全宗祀,林谏将

¹ 赵汭:《汪同传》,载程敏政辑:《皇明文衡》卷58,四部丛刊本,第1—7页。

² 揭泂:《陈子上先生墓志铭》,载陈高撰,郑立于点校:《不系舟渔集》附录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5年,第190页。

³ 陈高:《贞妇辞》,载陈高撰,郑立于点校:《不系舟渔集》卷9,第98页。

⁴ 揭泂:《陈子上先生墓志铭》,载陈高撰,郑立于点校:《不系舟渔集》附录,第190页。

⁵ 苏伯衡:《序》、《跋陈子上书》,载陈高撰,郑立于点校:《不系舟渔集》,第1页、第192页。

⁶ 《明太祖实录》卷6,台北: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,戊戌年十二月辛卯;卷7,己亥年正月庚申。

⁷ 张廷玉等:《明史》卷173,北京:中华书局,1974年,第7312页;苏伯衡:《故九灵先生戴公墓志铭》,四部丛刊本《九灵山房集》后附。戴良北投扩廓的经历,魏青《戴良生平踪考论》有详细考述,收入北京师范大学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编:《中国传统文化与元代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集》,北京:中华书局,2009年,第420—422页。

⁸ 丁鹤年:《奉寄九灵先生四首》,载丁生俊:《丁鹤年诗辑注》,天津:天津古籍出版社,1987年,第69页。

⁹ 苏伯衡:《故九灵先生戴公墓志铭》,四部丛刊本《九灵山房集》后附。

在大都的侄儿遣还故乡，“并写其相遗从弟询，作诗有云：‘泪写血书寄吾弟，早令昂侄继吾宗’”；自己则随元帝遁逃塞北，以尽臣节。¹

以上所述汪同、陈高、戴良和林谏等，皆为南人。元季南方士人夷夏观念淡漠，只论忠君而不问华夷，而经历了金元两代北族统治的北方士人，在这方面更甚于南士。至正二十五年（1365年），割据川蜀的明玉珍在给朱元璋的信中，就称元人国运已衰，然而“中原人物，解此者少，尚为彼用，殊为可恶”，言语之间颇为愤愤。²明军收复中原之时，追随元顺帝北走塞外的北方汉人不在少数。明太祖曾回忆当时的情形说，“未几胡君遁去，中原土地复我汉人，朕遂为生主。当是时，汉人弃丘陇，从胡人为中国仇者，至今身膏草野，骨委沙漠。”³明朝开国十年之后，汉人而出塞投奔北元者，《明实录》所载有蔡子英。蔡子英河南永宁县人，元末进士，曾入扩廓帖木儿幕府。扩廓帖木儿被明军追击出塞后，蔡子英隐入陕西山中，洪武九年（1376年）被捕获械送京师。明太祖对其甚为礼遇，欲授以官职，但他坚拒不肯，称“臣之仕君，犹女之适人，一与之醮，终身不改”，上书惟求速死。蔡氏滞留金陵期间，据说曾因“思旧主”而“忽一夜大哭不止”，明太祖最终为其所感，“知其志不可夺，敕有司送其出塞。”⁴

二、寄迹缙羽

缙羽客历来被视作游离于现实世界的“方外之士”，元明鼎革之际，元遗民为了躲避明廷征聘，不少人隐入穷山邃谷，混迹于释道之间。江陵人韦清本为江南诸道行御史台一名胥吏，因不满张士诚对江浙行省权力的篡夺，元季独自航海至大都“陈便宜二十事”，但却未获元廷理睬。无奈之下，韦清只得徒步还乡。朱元璋欲聘其为官，韦清以母老为名，“力乞骸骨侍亲”；数年后母亲去世，遂“服道士服，游五岳名山”。⁵文学家揭傒斯之子揭汝，和元末许多江南士人一样曾经航海北上，中途遭遇倭寇大难不死，一度与陈高共事于扩廓帖木儿幕中，元亡前夕“授秘书少监，未任而国事去”。⁶后隐居四明，

“假榻僧房”以终。⁷曾任参政的山西人黎铭，元亡“逃入王官谷为道士，后还俗为闻喜县社学师”，后担任儒学训导，“常自称老豪杰，讪谤朝廷。”⁸淮人焦白客居海上，元末不受张士诚征召，明初“所在搜儒，遂变名‘德乙郎’，浮寄冗食僧舍”。⁹“德乙”即“德一”，意谓品节坚贞如一。浙江山阴人张宪，曾出仕降元的张士诚，“吴亡，变姓名走杭州，寄食报国寺”，所作《发白马》、《白翎雀》等诗对蒙古君臣北逃沙漠不胜感悼，有“鼎湖龙去几时回”之句，对北元复兴尚怀期待。¹⁰

徽州休宁人金观祖（1318—1373），曾在家乡聚集“义兵”抵抗红巾，朱元璋部将邓愈平定徽州后，征聘他为婺源同知。金氏托疾坚辞，“结草庵于所居右源穷谷中，自号卧云居士，黄冠野

¹ 顾嗣立：《元诗选》癸集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01年，第938页。

² 杨学可：《明氏实录》，收入《四库存目丛书》史部第159册，第9页。

³ 朱元璋：《祭平章李思齐文》，收入钱伯城主编：《全明文》第1册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2年，第269页。

⁴ 《明太祖实录》卷110，洪武九年十二月己卯。

⁵ 杨维桢：《韦骨鯁》，钱谦益《列朝诗集》甲集前编卷7上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07年，第380页。

⁶ 戴良：《袁廷玉传》，四部丛刊本《九灵山房集》卷27，第20页。

⁷ 戴良：《祭揭秘监文》，四部丛刊本《九灵山房集》卷20，第21页。

⁸ 《明太祖实录》卷146，洪武十五年七月甲子。明初有遗民倾向的士人，并不以典教为失节。这与元代儒学教官的性质有关。元代训导等低级教官，似乎并不像典章里说的有政府发给的“俸禄”可食。南方地方儒学的维持，全赖南宋遗留的学田，温州儒学“师生廩膳皆系乎（学田）岁收”，而开化儒学学田不足，“延师以训导者，皆资诸生”。北方学校境况更差，滑县儒学竟然靠发放“子贷钱”牟利维持；邹平儒学没有学田，不得不“拘农家子弟，裹粮庠舍，厚进束修，以故农家父兄，往往不愿子弟受学，至有讼于上府”（以上分别参看孙以忠：《温州路儒学记》、鲁贞：《开化益学田记》、王承式：《滑州增广学田记》、张临：《买学田记》，分见李修生主编：《全元文》，南京：凤凰出版社，2005年，第50册第159页，第49册第362页，第47册第359页，第47册第79页）。在地方儒学任教，未必“食禄”，教师也未必有官方身份。洪武初年，“训导无常禄，犹儒生衣巾”（杜琼：《王半轩传》，《半轩集》附录，收入影印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第1231册，第468页），既无固定的薪资，也没有正式的官服，大概就是元制的子遗。明初有些士人虽然不愿出仕，但对担任学校教职却不拒绝，原因可能即在于此。

⁹ 王逢：《焦德乙郎哀辞》，载王逢：《梧溪集》卷6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5年，第303页。

¹⁰ 参见钱谦益：《列朝诗集》甲集前编第十，第666、668、674页。

服与樵牧相尔汝者,凡一十七年”,至洪武六年(1373年)方卒。金观祖在隐居时,“暇日惟哦叠山谢先生唐绝句诗评,有不胜感慨者。”¹谢叠山即绝食殉国的著名南宋遗民谢枋得(1226—1289),金氏此举显然是在以前代遗民的志节自励。正如钱穆曾经指出的,元季士人大多心中惟有“君臣大义”,而不论“华夷之别”,对“忠君”的认同超越了民族的畛域。因此,凡是忠于故国旧君者,不论其生前反抗者为谁,元遗民都会将其引为同调。上至殷周之际的伯夷、叔齐,下至宋元之交的文天祥、谢枋得,都是明初遗民诗中的常见人物;歌咏遗民事迹,俨然成为当时诗文的一大主题。谢翱《登西台恸哭记》在后世的广泛流传,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明初金华文士张孟兼(1338—1337)所作之笺注。张氏的《西台恸哭记注》,当时引起了各类人物的广泛共鸣,今天保存下来的跋文,共有21篇之多。以后人眼光来看,《登西台恸哭记》是拿来阐发“夷夏之防”、论证朱明开国“重光华夏”的极好题目,然而在这20余篇跋文当中,仅有一篇及于此意,²其余立意均在赞颂谢氏之忠节、揄扬“无所逃于天地之间”的“君臣大义”。³有跋文甚至称张孟兼作此笺注,乃是“有志”之举,暗示张氏对前朝的怀恋与不舍。⁴在元明更迭的特殊时代,这是一个极有象征意味的题目,从中颇可以折射明初士人眷恋胜国的隐微心情。

三、力绝征聘

对于清初开设博学鸿辞科延揽山林遗逸,以及顾亭林、傅青主等明遗民以死自誓的历史,后人大多耳熟能详;但明初大规模征辟前朝遗老、搜罗岩穴隐士的工作,却很少有人关注。察举和学校(监、贡)、科举,同为明初官吏的三大来源。⁵根据展龙的研究,洪武30年间,明太祖曾121次下令地方举荐贤才。⁶每次察举,州县都有一定的名额,官员举不足额或者“荐举非人”,都要受到惩处。弘治《抚州府志》记载的明初荐举名目,有通经儒士、明经博学、经明行修、贤良方正、孝悌力田、孝廉、怀才抱德、聪明正直、贤人君子、明经秀才、高年有德、老人、

人才、能书秀才、精通书算等15类之多。⁷洪武十五年,明太祖征召各地儒士入京“共论治道”,被选者竟达八千人之众,吏部从中择出“经明行修之士郑韬等三千七百余人”;⁸洪武二十三年(1390年)“选天下耆民才智可用者,得千九百十六人。”⁹这一时期荐举、征辟规模之大,是今天难以想象的。自号“不二心老人”的遗民李祁(?—1368后),即作诗感慨说“近闻铁网连山海,不信人间有卧龙”,¹⁰将无处不在的人才征辟,比作连山漫海的“铁网”。在这种形势之下,前元遗老鲜有不被征聘者。他们或因重重压力被迫出山就道,或者用各种办法摆脱官方的纠缠,继续遗民生涯。

元明之际为拒绝征辟,有舍生明志者。至正十七年,朱元璋部将邓愈克徽州,曾征聘当地著名学者郑玉(1298—1358)出山。郑氏坚拒不果,遂在绝食七日之后悬梁自尽,在当地士人当中引起轰动。¹¹至正二十七年朱元璋下苏州,张氏幕官马玉麟“仰药而卧,或掖以见总兵,先生曰:‘我疾不能屈膝矣’,寻卒”,遗诗仍念念不忘“中原消息”。¹²曾任翰林侍讲学士的永嘉人陈达(1322—1375)退居在乡,明军攻克温州时自杀

¹ 黄枢:《故徽州路婺源州同知金公行状》,载黄枢:《后圃先生存集》卷4,收入《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》第96册,第564页。

² 刘夏:《释登西台恸哭记》跋尾,载张孟兼:《白石山房逸稿》卷2,收入《四库存目丛书》集部第26册,第208页。刘氏称元明易代“廓天地之正气、洗日月之重昏,雪诸夏之积愤、仇胡王之见辱”,感叹谢翱未能目睹这一由“夷”入“夏”的历史转变。

³ 吴沉:《释登西台恸哭记》跋尾,载张孟兼:《白石山房逸稿》卷2,第205页。

⁴ 刘永之:《释登西台恸哭记》跋尾,载张孟兼:《白石山房逸稿》卷2,第205页。

⁵ 参看林丽月:《明初的察举(1368—1398)》,载《明史研究专刊》(台北)第二期。

⁶ 展龙:《明洪武时期征荐制度考论》,《史学月刊》,2009年第8期。本数据为文中各表数字相加而得。

⁷ 弘治《抚州府志》卷20《制科》,收入《天一阁藏明代方志续刊》第47册,第379—388页。

⁸ 《明太祖实录》卷148,洪武十五年九月己酉。

⁹ 《明太祖实录》卷206,洪武二十三年十二月戊子。

¹⁰ 李祁:《和王子让》,载《云阳李先生文集》卷2,收入《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》第96册,第197页。

¹¹ 关于郑玉的事例,参看刘祥光:《从徽州文人的隐与仕看元末明初的忠节与隐逸》,《大陆杂志》,第94卷第1期。

¹² 马玉麟:《丁未遗墨》,佚名:《东皋先生传》,载马玉麟:《东皋先生诗集》卷5,收入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1324册,第473—474页。

未果,患风痹三年后,“闻有荐之于朝者,遂却药不御而卒。”¹以“病不服药”来表示国亡后无意苟活的元遗民,并不乏其例。曾任南台御史韩准(1299—1371),元亡后隐居乡里,“园瓜有苦者,辄取尝之;及病甚,遂不服药以终,”²用一连串带有隐喻意味的举动表达亡国之痛。将乐县典史林士志(1301—1370),“将谒选京师,值世革。年七十,病不服药,三日而卒。”³

还有很多元遗民为保全名节想尽各种理由,或声称身痠疾病、或托辞侍养父母,名目不一而足。汴梁人钟纪,元代曾为儒学官,入明后“前后征辟,俱以疾辞”,所赠友人诗有“南州冠佩闲中老,北极星辰梦里真。邂逅相逢同一笑,苍头白发老遗民”之句。⁴所谓“北极星辰”(或“北辰”、“北斗”),在元遗民的诗歌语境里,指代的是遁归沙漠的蒙元朝廷,元遗民多用此寄托故国旧君之思。⁵福建闽县道学先生吴海(?—1390),与同乡多位遗老都有密切交往,留下了数篇遗民传记。洪武初年,因友人秦裕伯之荐,明廷遣使召其入朝纂修《元史》。吴海闻讯大惊,他首先给前来征聘的使者写信,陈述老母卧病、家中六丧未举等等不能出山的理由;然后致信责难举荐者,质问“新朝苟欲倡名义、厚风俗”,何必强迫前朝遗民出仕;同时又给地方官写信,陈说自己身患脚疾、耳疾、疮虐种种疾病,恳请其从中斡旋、为之脱解。⁶经历数度周折,吴海方得以遗民之身终老。

中国古代铨选,有“身言书判”四方面标准,身体有残疾者不能任官。为逃避征辟,有遗民甚至不惜自残身体,以断指的方式表达不仕的信念。⁷江西贵溪儒士夏伯启叔侄,“人各截去左手大指”,遭人告发后被捕至京。这个案件后来被载入《大诰》,其中有明太祖和夏氏之间的一段极堪玩味的对话:

朕亲问之,谓曰:“昔世乱,汝居何处?”对曰:“红寇乱时,避兵于福建、江西两界间。”(后言避难艰辛之状,略)……朕知伯启心怀忿怒,将以为朕取天下非其道也,特谓伯启曰:“……尔伯启言红寇乱时,意在他忿,至于天更历代,列圣相传,此岂人力而可为乎?……今去指不为朕用,是异其教而非朕所化之民。”⁸

明太祖清楚地知道,夏伯启不愿出仕明廷,是在他看来,朱元璋“取天下非其道”,即以武力叛乱起家。明太祖特意问起元末“红寇乱时”的往事,是为了凸显明朝平定“红寇”(即陈友谅)的安辑天下之功,以此论证明朝立国的合法性。然而在夏氏眼中,朱元璋与陈友谅皆属乱雄,实乃一丘之貉。不仅对陈友谅,对朱元璋部元季士人同样以“红寇”目之。清初史家谈迁称:“张士信《保越录》,盖守绍兴拒官兵(按,朱军胡大海部)全城事,出越人笔,词多指斥云‘红寇’”。⁹尽管隶属的派系不同,在当时正统士大夫看来,陈友谅和朱元璋并无二致。历史渊源问题,成为朱明政权获取士人认同的最大阻力。而夏伯启非难明政权的合法性,不愿与明廷合作,原因亦在于此。为“绝狂夫愚夫仿效之风”,夏氏被下令处死。¹⁰

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,有不少遗民被迫出山入仕。江西吉安儒士萧岐(1325—1396)在当地颇有名望,洪武初“大兴文治,旁求俊义”,萧岐和其兄长“累举不就”。萧氏坚卧不起的原因,亦是受儒家“君臣大义”观念的影响,这在

¹ 苏伯衡:《故元翰林侍讲学士陈公墓表》,见氏著《苏平仲集》卷13,四部丛刊本,第18页。
² 吴海:《元故资政大夫江南诸道行御史台侍御史韩公权履志》,载《全元文》第54册,第274页。
³ 吴海:《故前将乐县典史林君墓志铭》,载《全元文》第54册,第281页。
⁴ 钟纪:《赠一斋进士》,载顾嗣立:《元诗选》癸集,第1158页。
⁵ 如丁鹤年《兀兀》:“望乡薄暮凭西日,去国中宵礼北辰”,《自咏》:“悲歌舞罢龙泉剑,独立苍冥望北辰”,分见丁生俊:《丁鹤年诗辑注》,天津:天津古籍出版社,1987年,第79、257页;王翰《次子中韵》:“夜来独上高楼望,剑气苍茫北斗边”,见王翰:《友石山人遗集》(不分卷),国家图书馆藏清钞本。
⁶ 吴海:《与使者书》、《与秦景容书》、《投郑彦斌书》,载《全元文》第54册,第153—156页。
⁷ 明初此类“断指拒仕”的事例,在徽州民间文献中亦能见到,见章毅:《理学、士绅和宗族:宋明时期徽州的文化与社会》,香港: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,2013年,第155页。
⁸ 朱元璋:《大诰三编》第十《秀才剝指》,收入钱伯城主编:《全明文》第1册,第702页。
⁹ 谈迁:《枣林杂俎》智集“保越录”条,北京:中华书局,2006年,第2页。谈氏云“山阴祁彪佳有其书,常熟钱谦益录之,改帝号,非复旧本。”今本《保越录》(丛书集成初编影印十万卷楼丛书本)称朱军为“大军”,上下文意扞格,显经后人篡改。
¹⁰ 朱元璋:《大诰三编》第十《秀才剝指》,收入钱伯城主编:《全明文》第1册,第703页。

其所撰《义象传》中有明确的表达。据说明军攻克大都之后,曾将元宫中的一头老象运往南京。面见新君时,老象不听象奴指挥,拒不下拜。在王朝更替的敏感时期,这头被冠以“义象”之名的老象,霎时成为遗民竞相吟咏的题材。以夷齐自效的闽人危德华,作诗感慨“老象牵来心傍铁,悲号犹恋赭黄衣”。¹前元进士江西抚州人曾坚(?—1369),拒受明朝授予的官职,以“作《义象歌》见杀”。²僻居乡里的萧岐,居然也听到了这个故事,在所撰《义象传》中有一番意味深长的评论:

夫象,南兽也,而投之北方至寒之地,宜日惟南是思矣。乃今以八十年豢养之恩,甘于其地而不忍弃。象之性亦仁矣哉!其意岂不以为,昔也见京师城郭宫室百官人民之盛,承主上眷顾宠任之隆,所取天子之重器,其居有常所、食有常数,八十年非一朝夕比也。今虽气运更革,忍遽弃之耶?

萧岐以《春秋》笔法写下的《义象传》,颇能反映此时士人对易代之际进退出处的思考。这里的“南兽”,实际上隐喻的是“南土”。南土不为明廷服务,正如老象不拜新君,原因是蒙元于其有“八十年豢养之恩”;“今虽气运更革,忍遽弃之耶?”人固有南北之分、夷夏之别,但君臣之义却共当遵守;和南兽眷恋北地一样,萧氏并不认为南土的族群出身构成出任新朝的充分理由。萧岐又将义象之事,比作汉时的铜人和唐代的舞马:

昔魏明帝徙汉铜人于长安,铜人为之垂泪;唐玄宗有舞马,及禄山陷长安得之,马坚不舞。盖忠义之气,贯于金石,虽兽亦不肯忘所自也。

孟子谓“拟人必以其伦”,这是中国古代的写作传统。从萧岐的这两个比拟,我们可以看出他对明政权的定位。按照传统历史观念,曹魏是“篡汉”的僭伪政权,正统在蜀汉;而安禄山则是人所共知的“乱贼”。萧岐把不拜明太祖的老象和曹魏迁移的汉宫铜人、不为安禄山表演的玄宗舞马并举,显见朱明政权在他心中的地位。对于教导老象跪拜新主的象奴,萧岐谓其“反复不忠”,罪固当死。萧氏对易代后仕止进退的态度,在此表露无遗。³然而安居乡里多年之后,洪武十五年,明太祖“诏举天下贤良共

论治道,有司强起之”,在地方官的压力下,萧岐被迫出山就道。明太祖授以潭王府左长史之职,他“辞至再四”,以致触怒皇帝,“忤旨谪教云南楚雄府”,幸而太祖“念其忠言在耳,又悯其老”,将其追回。⁴

这些被迫中断遗民隐逸生涯走上仕途的士人,有些逐渐认同明朝的统治,也有人虽然身仕明廷,但始终心存芥蒂。前面提到的明初任教于国学的苏伯衡,即是一个显例。宋濂曾提及苏氏在明初的仕宦经历:

(苏伯衡)仕皇朝,由国子学录为学正,上亲擢国史院编修官,以贖辞归。濂以翰林承旨致政将还,天子命举可以自代者,即以平仲应诏。既至,复固辞。上亦悯其诚,特赐文绮楮币遣之。⁵

苏伯衡在明朝开国后不久便急于求退,并非因为政治严苛,“怀刑畏祸”,而是内心深处深刻的遗民情结。作为国学官员,苏氏出于职守写过《代翰林院劝进表》等官样文章,然而其中却委婉蕴含春秋笔法。《劝进表》称扬的朱氏功业,仅是削平陈张等“僭伪”军阀,而对朱明与元廷的关系这个不容绕过的重大问题,竟然只字不提。⁶毫无疑问,这正是他心中不可触及的痛处。苏伯衡曾为客死中原的蒙元忠臣陈高编定遗集,在《跋陈子上书》中,他盛赞陈高抛妻别子北投扩廓是“识轻重”的深明大义之举,“乡里与有荣耀”;同时讥讽陈高之同年钱用壬等

¹ 危德华:《军中谣五首》,载钱熙彦:《元诗选补遗》,北京:中华书局,2002年,第968页。

² 参看萧启庆:《元明之际士人的多元政治抉择:以各族进士文为中心》,收入氏著:《元代的族群文化与科举》,第113页。

³ 萧岐:《义象传》,载《萧氏世集》,收入《四库存目丛书补编》第99册,第679—680页。按,这则“义象”故事,是明初不少诗文赞咏的内容,隐喻的也都是类似主题。福清人林鸿撰有《义象行》,中云“嗟尔食禄人,不若饭豆豉。象何洁,尔何污,天子垂衣治万世,俾全象德行天诛。呜呼象兮古所无,呜呼象兮古所无!”对仕明“贰臣”极尽讽刺。(林鸿:《鸣盛集》卷3,收入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第1231册,第48页。)稗史甚至将这头忠心不二的“义象”和屈节仕明的著名文人危素联系在一起,编排出一个讽刺降臣的故事,见蒋一葵:《尧山堂外记》卷80,收入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1195册,第21页。

⁴ 周是修:《正固先生萧君行述》,载萧岐:《萧氏世集》,第642—648页。

⁵ 宋濂:《序》,载苏伯衡:《苏平仲文集》四部丛刊本卷首。

⁶ 苏伯衡:《代翰林院劝进表》,载苏伯衡:《苏平仲文集》卷2,四部丛刊本,第7页。

人,屈节仕明为不识大体,最终“为乡里羞”。¹这显示了苏氏在出处问题上的真实态度。在仕明官员当中,苏伯衡这种心态并非孤例,钱穆在《读明初开国诸臣诗文集》中所揭示的明廷官员对前朝的怀念,大多可作如是观。

四、不奉明廷正朔

在中国,从《春秋》大书“春王正月”开始,采用何种纪年就不再只是一个简单计时的问题,而是在历史典故的反复诠释之下,逐渐变成了一种看似隐微、实则显白的政治立场表达方式。据说陶渊明在东晋时所作之诗皆书年号,入宋后却仅题甲子,以示“耻事二姓”之意。²这个故事在元明之际的士人当中,获得了异乎寻常的回应,“书甲子”成了遗民诗里反复出现的意象。遗民王逢在写给友人鲁渊的诗中,有“相期文苑传,独立义熙年”之语,以陶氏贞节为榜样;致谢长吉诗则云“甲子书茅屋,庚申梦紫宸”,所谓“庚申”指生于庚申年(1320年)逃亡塞外的元顺帝,意在以忠元相劝勉。³杭州人钱惟善(?—1369)在张士诚据吴后便绝意仕进,所作诗云“汉史丁公那及齿,陶诗甲子不书元”,意谓耻学背楚降汉的丁公而以陶氏贞节自效。⁴吴兴人沈梦麟元末解官归隐,“明初以贤良征,辞不起”,所作诗有“陶令归来题甲子,林逋老去种梅花”之句。⁵淳安人汪汝懋元末居官有善政,易代后隐居以终,戴良所作挽诗云“陶潜犹纪晋,黄绮肯归秦”,比之于不忘先朝的陶渊明。⁶文学家贡师泰的族子贡性之,明初遭朝臣举荐,遂改易姓名,“避居越之山阴”,“躬耕自给以终其身”;其所作《墨菊》有“莫惊颜色改,不是义熙年”之句,对元明更革不胜感慨。⁷

江西吉水布衣郭钰,元末“转侧兵戈”,其诗多纪时事,“于元末盗贼残破郡邑事实,言之确凿”。易代之后,郭钰作有《甲子》诗,亦借陶潜的典故表白心迹:

渊明赋归去,正合书义熙。衣冠晋江左,寄奴我何知。春秋乾侯笔,凡例日星垂。诛心虽探微,临难将安施。乃知书甲子,当在永初时。古人日已远,浇风日已漓。空余五柳树,萧瑟西风吹。⁸

这首诗假托咏史,隐喻了元明之际的众多时事。明太祖即位的第二个月,即发布诏令革除胡服、衣冠复古,但晋宋鼎革并无更易冠裳之事,“衣冠晋江左,寄奴我何知”表面上说陶氏仍着晋时衣冠,实谓自己不从新朝之制。春秋时鲁昭公讨伐季氏不成,只得流亡国外,至死客居于晋国乾侯;鲁国实际掌权者虽然是权臣季氏,但《春秋》纪事在每年的开头必书“公在乾侯”,以示正统之所在。在郭氏看来,元顺帝被明军北逐出塞,便如同鲁昭公出居乾侯;朱明虽然建国,可是北元政权犹在,依据《春秋》义法,仍然不能视作正统。以出亡塞外的北元为正统的观念,在明初元遗民中并不罕见。王逢诗中便有“好在医闾北,徘徊紫气浮”之语,“医闾”即作为北镇的医巫闾山,意谓元统未绝、王气在北;至其晚年,元顺帝殁于沙漠已久,王逢的态度稍有软化,但依然仅称明朝皇帝为“南朝天子”,⁹不把朱元璋看作是大一统之君。郭钰矢志以陶潜自效,明廷曾“以茂才征,辞疾不就”,¹⁰入明后所作诗歌都用干支纪年,不书洪武年号。这类不奉明廷正朔的举动,在元遗民中颇有其人。著名画家倪瓒(1306—1379),在天下大乱之前便“洁身栖遁”,据说他也仿效陶潜,“昔

¹ 苏伯衡:《跋陈子上书》,载陈高撰,郑立于点校:《不系舟渔集》,第191—192页。

² 关于“晋征士陶潜”在后世的象征意义,参看赖松伟:《从和陶诗文看元明间儒生之仕隐观念》,载香港大学中文系编:《明清史集刊》,第2卷(1986—1988年)。

³ 以上参看王逢《俭德堂怀寄》组诗,载王逢:《梧溪集》卷5,第286、288页。王逢是元遗民中对新朝讨伐最为激烈者,其遗民心志参看李军:《诗旌忠孝节义鬼,白头终师鲁仲连——论王逢其人其诗》,载《元代文化与文献研究》第一辑,第201—218页。

⁴ 钱惟善:《江月松风集》附录,《丛书集成续编》第110册,第399页。

⁵ 沈梦麟:《挽徐止善先生》,载钱熙彦:《元诗选补遗》,第819页。

⁶ 戴良:《哭汪遁斋二十四韵》,载戴良:《九灵山房集》卷17,第8页。

⁷ 贡性之:《墨菊》,载顾嗣立:《元诗选》二集下,第1199页。

⁸ 郭钰:《静思集》卷2,收入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第1219册,第173页。

⁹ 王逢:《即事五首寄桃浦诸故知》,载王逢:《梧溪集》卷7,第345页。

¹⁰ 参见永瑛等: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168,《静思集》提要,北京:中华书局,1965年。

日陶征士书甲子不书元，先生亦不书。”¹浙江开化人鲁贞，以学行著称于乡里，所遗文集“凡元代所作，皆题至正年号，其入明以后，惟题甲子，殆亦栗里之遗意”。²闽县人吴海，元亡后隐居不出，“为文但书甲子”，其友人王翰为拒绝明廷征辟而自裁，吴海为之所作墓志，特“书其歿之岁曰‘著雍敦祥’”。³以上都是用这种看似委婉、实则决绝的纪年方式，表达对新政权的排拒。

五、元遗民的成因及对明初的政治影响

北投蒙元、遁入方外、不奉明廷正朔以及力拒征辟，是元遗民表达故国旧君之思、拒绝认同新朝的常见行为方式。支撑这些行为的，是儒家传统中一以贯之、宋代以来又被理学家强化的“君臣大义”。让人意外的是，这些汉族元遗民当中，许多具有儒家《春秋》学的学术背景。例如，为拒绝出仕朱元璋部而自裁明志的徽州学者郑玉，其学“覃思六经，尤邃《春秋》”，⁴与其交好的另一位徽州遗民学者赵沔（1319—1369），更是元末《春秋》学的宗师巨擘。⁵入明后隐居不起的淳安学者汪汝懋，元末科举以《春秋》起家，“所著书有《春秋大义》百卷”；⁶其同乡遗民鲁贞，著有《春秋节传图例》。⁷山东鱼台人王应隆之祖父，“在元季治《春秋》有盛名，僭伪多征辟之，皆不应，”友人劝其出仕，则“引大义以答之”，甚至“旧友有易节登膺仕者，峻拒不相见”。⁸此类事例甚多，不烦一一赘举。值得注意的是，“君臣大义”与“华夷之辨”同属于《春秋》学的核心要旨，而南宋儒者受政治形势影响，治《春秋》尤其强调夷夏之防。⁹一般情况下，这两个主题并不会发生冲突，然而元明易代属于由“夷”入“夏”的特殊历史时期，造成了二者之间的内在紧张。经历了蒙元近一个世纪的统治，华夷之间在文化上乃至心理上的鸿沟被逐渐填平。明初的方孝孺，对此有很好的描述：

俗之相成，岁熏月染，使人化而不知。在宋之时，见胡服、闻胡语，犹以为怪；主其帝而虏之，或羞称其事。至于元百年之间，四海之内起居饮食、声音器用皆化而同之。斯民长子育孙于其土

地，习熟已久，以为当耳。昔既为其民矣，而斥之以为夷狄，岂不骇俗而惊世哉？¹⁰

方氏的分析颇中肯綮，极好地描摹出元季遗民士大夫的心态。在面临“君臣大义”与“夷夏之辨”的冲突时，元季士人普遍选择笃守前者，而漠视后者。在他们看来，“忠义”或者说报答君主“涵育”之恩，是高于一切的价值选择；而效忠对象的族属，并非是考虑的重点。这在元季有诸多例证。西昌人杨介曾任主簿，至正十八年打着兴复“宋”统旗号的陈友谅攻克西昌，¹¹下令“录寓官以待用”，杨介其时正在家乡：

君谓其友曰：“设有相污，吾已辨一骂速死矣。”去即山中屏绝以自晦……君有季弟君武，素放诞。一日相聚，语涉讥诽，君即变色大诟，攘袂欲殴之曰：“我元八十余年涵养生育，有何负若而为此语？恨不杀汝以启先翁。”家人震惧，为涕泣叩首，请勿复尔，乃解。¹²

杨介“闻人言东南某所某州已复，辄为之喜而不

¹ 王穉登：《清閟阁集序》，载倪瓒：《清閟阁集》卷首，收入《丛书集成新编》第110册，第59页。关于倪瓒的晚年出处，参看王颀：《晦缘耗音——倪瓒生卒时及晚年行踪考辨》，收入氏著：《古代文化史论集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7年，第373—380页。

² 永瑆等：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168，《桐山老农文集》提要，第1458页。

³ 钱谦益：《列朝诗集》甲集前编第十，第719页。

⁴ 弘治《徽州府志》卷9，收入《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》第22册，第12页。

⁵ 赵沔在《春秋》学上的成就，参看吴兆丰：《元儒赵沔的游学、思想特色及治学历程》，载香港中文大学《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》，第51期（2010年7月）。

⁶ 戴良：《故翰林待制致仕汪君墓志铭》，载戴良：《九灵山房集》卷23，第18页。

⁷ 钱熙彦：《元诗选补遗》，第510页。

⁸ 解缙：《云岩松屋铭》，载光绪《鱼台县志》卷4，第36页下，国家图书馆藏光绪刊本。

⁹ 南宋《春秋》学特重“攘夷”，参看牟润孙：《两宋〈春秋〉学之主流》，收入氏撰《注史斋丛稿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09年，第69—87页。

¹⁰ 方孝孺：《后正统论》，载徐光大点校：《逊志斋集》卷2，宁波：宁波出版社，2000年，第58页。

¹¹ 和北系红军一样，以徐寿辉为首的南系红巾政权，也依据传统儒学的“夷夏之辨”理论发动民众反元。参看拙作：《元明之际“夷夏”论说举隅——兼说清代官修史书对明初史事的隐没和篡改》，《中国典籍与文化》，2013年第4期。

¹² 刘楚：《故进义副尉临江路清江县主簿杨君墓表》，收入《全元文》第54册，第614页。

寐”，始终心系元朝，而视出仕汉族军阀政权为“相污”；其弟对蒙元朝廷稍有讥讽，则以“我元八十余年涵养生育”为政府辩护。洪武元年（1368年），明军克大同，行省平章睢州人孙德谦自杀殉难，遗诗嘱咐诸子“忠孝各尽道，庶几报君亲”。¹王翰自杀明志前所作遗诗，亦有“寸刃在手顾不惜，一死了却君亲恩”之句。²报答君亲之恩，是元季许多士人的最高价值选择。至于汉族士人是否因其族群身份，便有理由忘却蒙元旧君、出仕新朝，前文提到的赣人萧岐所作的《义象传》，已经通过“老象”的比喻，做了很好的说明。正如钱穆的研究所揭示的，对于传统儒学中的“夷夏”观念，元季多数士人视之漠然；蒙古皇帝被看作臣民之共主，蒙元朝廷被视作天下之正统。“君臣大义”超越了“华夷之辨”，是造就众多汉族元遗民的首要原因。

除去士人夷夏意识淡漠，朱明集团特殊的军事与文化渊源，同样是元遗民难以认同明政权的重要原因。与后世读史者心目中明太祖“汛扫胡尘”的华夏英雄形象不同，朱明集团凭借红巾武装取得政权，在当时正统士大夫看来是“取天下非其道”，难逃僭伪之名，一如前文夏伯启叔侄事例中所见。而且元末红巾运动还带有浓重宗教色彩，³正统士人不仅视其为“贼”、“寇”，而且视之为“妖”。北系红巾军汝阳起事，时人郑元祐作诗称“近者汝阳妖贼起，挥刀杀人丹汝水”；⁴南系红军攻徽州不克，当地学者、后来的元遗民舒頔，作诗庆贺“刚风万里扫妖祲，甘雨四方清瘴烟”。⁵尽管朱元璋部与韩宋红巾政权仅存在名义上的关系，宗教色彩并不明显，但在当时人眼中，朱部与其他红巾派系皆属一丘之貉。至正十九年（1359年），朱元璋部攻杭州，时人陈基（1314—1370）记称“妖寇犯杭”；⁶洪武元年，明军克大都，戴良作诗感慨“王气幽州歇，妖氛国步屯”；⁷元帝北遁出塞，王逢诅咒“纷纷攘攘灰黄巾，妖血徒膏草野尘”，⁸皆目朱部为“妖”。朱元璋的这种特殊军事与文化渊源，与正统士大夫心中的“圣君”形象格格不入，这也是造成明初政权合法性困境的重要因素。

在元季士人当中，“君臣大义”压倒了“华夷

之辨”，对君主“忠义”被视作最高的价值；在这种思想背景之下，所有的反元活动均被视为叛乱、僭伪，无法获得合法性支持。这种观念极为强烈，以致明初官方也不得不作出妥协，必须以士大夫的意识形态为准绳，重新定位自身与被士大夫视为“妖寇”的红巾武装、以及被士人奉为正统的蒙元政权的关系。明初官修《元史》对朱元璋起家的叙述，是一个很好的例证。至正十五年六月，朱元璋率部由采石渡江，南下开辟自己的势力范围。在朱氏集团成长的过程中，这是一个标志性事件，《元史》对此有如下记载：“是月，大明皇帝起兵，自和州渡江，取太平路。自红巾妖寇倡乱之后，南北郡县多陷没，故大明从而取之。”⁹这段简洁的叙述里蕴含了丰富的涵义。“红巾妖寇”是士大夫对各地红巾武装的蔑称，《元史》采用这一称呼，显示明初官方看待元末之乱的态度，已经向士大夫的立场妥协。史官在叙述元末历史时，也不得不为明太祖隐讳出身，将其置于“红巾妖寇”之外。然而事实是，朱元璋渡江之时，其身份正是韩宋红巾政权任命的左副元帅，而且直到至正二十六年（1366年）韩宋政权覆亡，朱部名义上一直听命于龙凤政权。¹⁰而《元史》称“南北郡县多陷没，故大明从而取之”，这与朱元璋开国后屡屡

¹ 孙德谦：《死节自决》、《付诸子》，载顾嗣立：《元诗选》癸集下，第927页。

² 王翰：《自决》，《友石山人遗稿》（不分卷），国家图书馆藏清钞本。

³ 元末南北两支红军，均与白莲教有深厚渊源，杨讷《元代白莲教研究》一书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4年）对此有缜密研究。自吴晗《明教与大明帝国》一文发表以来，人们多以为元末红巾起事与明教有某种关联，杨氏已指出此系对史料的误读。

⁴ 郑元祐：《汝阳张御史死节歌》，载郑元祐：《侨吴集》卷3，《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》第95册，第736页。

⁵ 舒頔：《次王和夫见寄》，载舒頔：《贞素斋集》卷7，收入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第1217册，第661页。

⁶ 陈基：《精忠庙碑》，载《全元文》第50册，第466页。

⁷ 戴良：《哭揭秘监三十四韵》，载戴良：《九灵山房集》卷17，第9页。

⁸ 王逢：《秋感》，载王逢：《梧溪集》卷3，第124页。

⁹ 宋濂等：《元史》卷44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76年，第925页。

¹⁰ 关于朱元璋政权与北系红军的关系，参看李新峰：《朱元璋任职考》，收入朱鸿林编：《明太祖的治国理念及其实践》，香港：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，2010年，第141—168页。

宣称“朕取天下于群雄之手，不在元氏之手”如出一辙，¹都意在扭转朱氏集团的“反叛”形象而罔顾事实——无论后来的中原地区，还是作为朱元璋部根据地的“兴王五府”（应天、太平、镇江、宁国和广德），实际皆取自元人而非汉族军阀之手。明代开国之后的诸多做法，譬如编造太祖投军乃系神启的神话、²掩盖朱氏与韩宋红巾政权的关系、强调元亡系“天运”使然等等，³目的不仅是为了神化皇权、或者消泯朱氏曾为人下的历史，更重要也是更迫切的，是为新政权洗脱士大夫最为严厉的指责——“叛逆”。明初对元季历史的曲讳，更多地是在“造反无理”的窘境下，对士大夫立场的妥协与屈从。

除去在意识形态上的妥协，面对众多拒斥新朝的“遗民”，明代开国之后采取了两方面的政策。其一是以严刑酷法为要挟，强制士人为明廷服务，洪武十八年《大诰》所载的深受后人诟病的“士大夫不为君用”律，便是典型的例子。有研究认为明初待士严苛是导致元遗民大量出现的原因，这实际上颠倒了历史的因果。朱元璋起家及立国之初，极力延揽人才、遇士甚厚；而后来士人与国家的紧张关系，确如钱穆所论，是因上下睽违、“相激相荡”而成，“固不得一切归咎于偏面也。”⁴正如我们在前文夏伯启叔姪断指不仕的例子中看到的，元遗民对明政权的鄙夷与漠视，即是明初士人与国家“相激相荡”的典型一例。其二是积极塑造新政权的正

统形象，以儒学传统的“夷夏”理论，论证朱明立国的合法性。明初当政者主动重拾“华夷之辨”的命题，在“用夏变夷”、“复古”等口号下推行各项文化变革，以期重新激发士人的族群意识，建立其对汉族新政权的认同。这些措施深刻塑造了明代前期的社会形态。⁵而明初广泛存在的遗民现象、以及由此造成的政治合法性困境，构成了解读这些政治举措的基本文化和社会背景。

[作者张佳（1981年—），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助理研究员，上海，200433]

[收稿日期：2013年9月5日]

（责任编辑：李媛）

¹ 《明太祖实录》卷53，洪武三年六月丁丑。

² 朱元璋：《记梦》，载《全明文》第1册，第178页。

³ 最明显的例子是元主庚申君亡殁塞外后，明廷谓其当年不战而逃系“知顺天命、退避而去”，谥为“顺帝”，强调元明易代根本原因系“天命”改易，而非明军进攻。

⁴ 钱穆：《读明初开国诸臣诗文集》，《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》（六），第145页。

⁵ 明初为构建政权合法性而在“用夏变夷”口号下推行的文化变革，深刻模塑了明代前期的社会形态。相关讨论参看拙作：《别华夷与正名分：明初的日常杂礼规范》，《复旦学报》，2012年第3期；及《再叙彝伦：洪武时期的婚丧礼俗改革》，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》第八十四本第一分（2013年3月）。